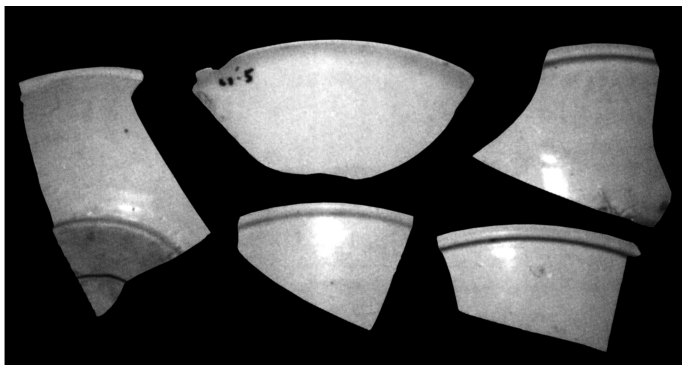


字军侵占时，法蒂玛王朝统治者为避免城市落入十字军之手而主动焚毁，之后逐渐变成开罗的垃圾场^{〔1〕}。1912年，开罗阿拉伯艺术博物馆(Musée de l'art arabe du Caire)对福斯塔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日本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等学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这次发掘出土的资料进行两次拣选，从六七十万片陶瓷残品中拣选出约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代跨度从唐至清代，其中就包括唐代“华北白釉器”^{〔3〕}。秦大树对这批标本进行重新拣选，剔除一些被误认的伊拉克等地产品，确定数量为一万片^{〔4〕}。其后，埃及文物局(Egyptian Antiquity Organization)、埃及美国研究中心(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等机构又对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出土了不少中国陶瓷器^{〔5〕}。马文宽等认为福斯塔特早期地层中与越窑青瓷及八至九世纪的伊斯兰陶器共存的白瓷绝大部分为定窑产品^{〔6〕}。根据秦大树的研究，除一件可早至晚唐时期的侈口玉璧足碗为晚唐河南窑场(巩义窑)的产品外，其余白瓷器没有早到九世纪的产品，五代的白瓷产品包括唇口碗、海棠形杯、方盘等，产品的来源包括邢窑、定窑等^{〔7〕}。从早稻田大学发掘报告书刊布的白瓷出土情况看，发掘者认为仅十六片属于唐末五代定窑唇口碗残片^{〔8〕}，从器物线图来看，这些定窑白瓷均晚至十世纪中叶前后的五代末至北宋初，且不排除一些属于南方白瓷。

1995年以后，日本中近东文化中心与埃及政府古物部对福斯塔特历年来发掘出土的总数超过百万件的遗物进行编目，据弓场纪知统计，晚唐五代时期中国陶瓷有四十片，包括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和巩义窑白釉绿彩陶器^{〔9〕}。根据弓场纪知刊布的白瓷



图一四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中国白瓷

〔1〕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弓场纪知：《埃及福斯塔特遗迹出土的晚唐至宋代白瓷》，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2〕 Bey, Aly Bahgat, Albert Gabriel, *Fouilles d'al Fousâtât*, E. de Boccard, 1921, 5.

〔3〕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李锡经、高美喜译，6—1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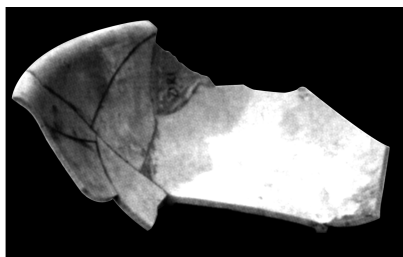
〔5〕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3页，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7〕 秦大树：《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发现的中国陶瓷》，《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8〕 桜井清彦、川床睦夫：《エジプト・イスラーム都市 アル＝フスタート 遺跡発掘調査 1978—1985年》，435页，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年。

〔9〕 弓场纪知：《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黄珊译，《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



图一五 肯尼亚曼达遗址出土
五代白瓷碗

照片(图一四),中间两件是定窑五代后期的产品,而最后两件时代似已晚至北宋前期。

2. 肯尼亚 有曼达(Manda)遗址。

曼达遗址 位于肯尼亚北部海岸拉穆群岛的曼达岛上。1965—1978年,英国考古学家奇蒂克(Neville Chittick)在这里进行了数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中国陶瓷器、伊斯兰陶器和宝石等。出土的中国陶瓷大部分属于曼达遗址分期的第一期(九世纪中期至十一世纪早期),包括九世纪初出现的广东产青瓷大罐、长沙窑彩绘瓷,以及最

早出现在850年以后的越窑青瓷、850—950年之间的精细类南方白瓷以及发掘者认为胎质比南方白瓷粗且出现时间稍早于前者的白瓷唇口碗^[1]。2006—2011年,秦大树等两次对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调研,在蒙巴萨耶稣堡(Fort Jesus)发现四件曼达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其中一件白瓷碗被认定为十世纪前期的繁昌窑产品(图一五)^[2]。相同造型的器物出土于定窑遗址北镇区五代后期的地层中,高美京认为亦有可能为早期定窑的白瓷产品^[3]。可以肯定的是,这件器物的时代应为十世纪中叶的五代后期。

三 唐五代中国白瓷的输出问题

通过对海外发现唐五代白瓷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对这一时期白瓷的输出、流转和消费状况进行探讨,从而更清楚的认识白瓷在唐五代输出陶瓷中的地位及特性。

(一)白瓷输出的形式

按照是否以商业贸易为目的,唐五代白瓷的输出包含贸易输出与非贸易输出两种形式。九世纪以后,各地的白瓷主要是以贸易输出的形式与其他中国陶瓷一起运销到各地。在此之前,日本和朝鲜半岛因为与唐王朝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已经有一小部分的陶瓷产品输入,主要的代表是早期的越窑青瓷、唐三彩和极少量的白瓷器等。这些陶瓷产品的输入主要与朝贡使、留学生和求法僧人的活动有关,属于典型的非贸易输出。来唐的日本、百济、高丽人,以接受赏赐和私下购买的方式获得珍贵的“唐物”,并带回国内。

日本在八世纪前半期开始有少量的唐三彩出现,出土地域有限,出土遗迹的性质限于官

[1] Chittick, Neville, *Manda: Excavations at an Island Port on the Kenya Coast*,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84, 66—67.

[2] 秦大树:《肯尼亚出土中国瓷器的初步观察》,《2011 古丝绸之路:亚洲跨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3年,图5。

[3] 承高美京女士见告,谨致谢忱!

署、寺院^{〔1〕}。而整个八世纪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数量十分有限,应是由遣唐使或学问僧携归,奈良平城京左京三条四坊十一坪出土的白瓷辟雍砚即属此列。日本这种非贸易形式的唐物输入,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奈良正仓院的收藏。这种遣唐使私下购买携入国内,进奉天皇或经由官方组织再交换的“官商作用”,也直接带动了随后出现的鸿胪馆贸易^{〔2〕}。九世纪以后,非贸易输出日本的白瓷仍然存在。日本出土数量众多的白瓷唇口玉璧足碗及少量执壶,多发现在寺院遗址中。长安城青龙寺、西明寺遗址发现大量晚唐时期的白瓷碗,其中唇口玉璧足碗占较高比例,多与寺院饮茶有关^{〔3〕}。白瓷茶器在寺院中的出现,应与中晚唐时期中国寺院流行的饮茶风俗对日本寺院茶道的影响相关。日本茶道推行史上最重要的僧人空海曾于九世纪初先后求学于西明寺、青龙寺,806年回国时带回石茶碾并种植茶园,永忠和尚则在西明寺生活三十年,由他们所推动的饮茶风潮直接影响了以嵯峨天皇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阶级的饮茶新风尚^{〔4〕}。唐代寺院遗址中常见的白瓷茶碗也随着这一风尚被日本遣唐使、学问僧一并带入日本,并为贵族茶道所用。嵯峨天皇女侍惟良氏所作《和出云太守茶歌》提到的“巩县碗”(巩义窑白瓷碗)即为一例^{〔5〕}。

朝鲜半岛的情况与日本类似。隋至初唐时期,百济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年(646年),因百济攻打唐的盟友新罗而中断^{〔6〕}。太宗时期,唐廷对百济朝贡使多有赏赐^{〔7〕}。初唐时期,白瓷在唐境仍属奢侈品之列^{〔8〕},又结合长乐公主墓辟雍砚的出土例证,发现于扶苏山城的辟雍砚,可能即为太宗赏赐百济朝贡使之物。八世纪以后的新罗时期,唐三彩等少量中国陶瓷陆续传入朝鲜半岛,也主要是依赖朝贡-赏赐体系,或者是数量众多的遣唐使、留学生、求法僧人等在长安、洛阳或扬州进行高档奢侈品的采购^{〔9〕}。同样,寺院遗址出土较多白瓷唇口玉璧足碗及少量执壶等茶器,应为中晚唐以后的来唐求法僧人携归,并对朝鲜半岛贵族、僧侣阶层的饮茶风尚产生了影响。

(二)输出白瓷的数量与来源

各地的发掘规模不同和资料刊布情况的限制使得唐五代白瓷的输出数量与规模很难作出

〔1〕 谢明良:《日本出土唐三彩及其有关问题》,《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裴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 裴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190、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青龙寺遗址出土“盈”字款珍贵白瓷器》,《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101、102、198、199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4〕 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27—33、3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5〕 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3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孙新:《世界中的日本文化——摩擦与融合》,10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

〔6〕 程妮娜:《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2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7〕 贞观十一年(637年)百济王派太子隆朝贡。《旧唐书·太宗本纪下》:“十二月辛酉,百济王遣其太子隆来朝。”《旧唐书·百济传》:“十一年,遣使来朝,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劳之,赐彩帛三千段并锦袍等。”

〔8〕 李鑫:《唐代早期白瓷的生产与流通》,《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3期。

〔9〕 申浚:《韩国出土唐三彩》,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巩义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

准确计量。不过,通过几处代表性遗址仍可观察到相对于越窑青瓷、长沙窑瓷器等其他输出中国瓷器,白瓷始终不是一类输出数量很大的产品。例如,东亚地区的日本出土唐五代白瓷数量仅占这一时期中国陶瓷总数的 13.42%,远低于越窑青瓷 81.72% 的占比。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出水数量巨大的中国瓷器,显示了九世纪中期中国陶瓷输出印度洋地区的规模与各类产品的比重,约三百件北方白瓷相较五万余件长沙窑瓷器和九百余件越窑及广东产南方青瓷也仅占很少的数量。在印度洋贸易圈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曼泰遗址出土白瓷也仅占到九至十世纪中国陶瓷器的 10%。这一时期输出陶瓷中某类产品的多寡与窑场本身的繁荣程度并不直接相关,而是直接反映了启航港口所见陶瓷的结构与比重,此时中国陶瓷输出的启航港主要位于东南沿海,产于北方的白瓷运输成本较高,本就相对少见于这些港口城市,这是造成白瓷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中国陶瓷,尤其是南方地区窑场的产品较少的原因。

就白瓷本身的来源来看,最早通过非贸易形式输出东亚地区的白瓷,如七世纪前半初唐时期进入百济、八世纪前半盛唐时期进入日本的白瓷辟雍砚,均是巩义窑产品。九世纪以后中国陶瓷开始大规模输出,邢窑和巩义窑白瓷最先加入到贸易陶瓷组合中。时代集中于九世纪的泰国林门波与郭各考、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均见两类白瓷并存。尸拉夫的发掘表明,巩义窑白瓷可能要比邢窑白瓷到达波斯湾的时间略早^[1]。定窑白瓷的贸易输出则开始于十世纪左右^[2]。与定窑白瓷开始输出海外基本同时或稍晚,也有少量南方白瓷出现在贸易输出产品中。至十世纪中期以后,即五代末期至北宋前期,随着南方白瓷在贸易输出产品中的大量出现,以及越窑青瓷在贸易输出产品的数量构成上占据绝对优势^[3],北方白瓷在海外市场基本绝迹,中国陶瓷的输出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 贸易白瓷的输出起点

九世纪以后,中国陶瓷输出形成规模,东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发现有这一时期中国陶瓷的地点,均包含有数量不等的白瓷。白瓷作为输出商品加入到中国陶瓷贸易的组合中来,同长沙窑、越窑等其他中国陶瓷集中装载,批量销往海外。

九世纪以后,最重要的白瓷输出港口是扬州港。扬州港发现数量众多的不同窑场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需要,也有相当一部分对外输出。从晚唐开始海外发现的中国陶瓷器,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从扬州港运出^[4]。但是这种输出与国内市场没有结构上的差别,即输出的产品均为扬州城中可以见到的品类,并没有区分哪些产品是供应国内市场、哪些产品用于外销。

[1]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iráf; First Interim Report, *Iran* 1968, 6:1-22; Excavations at Siráf; Second Interim Report, *Iran* 1969, 7:39-62.

[2] 秦大树、高美京、李鑫:《定窑涧磁岭窑区发展阶段初探》,《考古》2014 年第 3 期。

[3] 秦大树、谷艳雪:《越窑的外销及相关问题》,沈琼华《2007 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 年。

[4] 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 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 年第 5 期。

这是早期中国陶瓷输出的一个重要特点〔1〕。从晚唐时期开始,大量北方白瓷出现在扬州城的市场中,除表明其是南方地区重要的商品中转中心外,还与其本身是重要的陶瓷输出港口有关。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是晚唐时期中国陶瓷贸易组合的典型代表,而其中邢窑白瓷、巩义窑白瓷和青花瓷等北方地区产品均有同类产品在广州城发现,这样完备的产品结构不见于其他港口遗址,表明扬州作为白瓷输出启运港的突出地位。

扬州由于五代战乱造成的“江淮不通”而衰落〔2〕。而随着区域开发的进程加速、越窑的兴盛及跨海路线的变更等原因,尤其是伴随越窑产品的大规模外销,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扬州附属港口的明州港在九世纪中叶迅速发展成为对外陶瓷贸易港口,并在吴越国时期成为东南沿海的主要外销港口之一,而且具备了一个成熟港口城市的货物储备和商品中转的功能,其产品销售至东亚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3〕。宁波城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晚唐五代白瓷,尤以唐末五代时期的定窑白瓷为多〔4〕。表明明州承继扬州作为白瓷贸易启运港的重要地位,而定窑白瓷的较多发现,也与唐末五代时期输出白瓷产品结构由巩义窑、邢窑向定窑的转变相一致。

晚唐五代时期另一个重要的陶瓷输出港口是广州,其主要面向的海外市场是东南亚,并间接面向印度洋区域。《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录了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仅云集广州经商的伊斯兰、犹太、基督教、袄教教徒就被屠十二万人,来中国通商的尸拉夫和阿曼商人也遭到迫害,从尸拉夫到中国的航运就此中断〔5〕。广州作为陶瓷贸易港口,其主要输出的商品为广东地区青瓷和长沙窑瓷器。周世荣认为广州的暴乱和外商的被屠是导致长沙窑衰落的主要原因〔6〕。中唐以后,白瓷逐渐在南方地区大范围流行,而广州附近仅有零星出土。数量极少的白瓷器在广州的发现,更有可能是这些来自北方的产品在扬州装载南下停靠广州时遗留下来的。如在晚唐时期,广州发现少量白瓷的同时,在其东北部、台湾海峡西侧的厦门也同时出土了数量很少的白瓷产品〔7〕,勾画出了白瓷向南、向西输出过程中在中国范围内的运输线索。

(四)贸易白瓷的中转与终端

综合考察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沿岸的白瓷出土情况,有少量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在

〔1〕 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

〔2〕 《新五代史·刘铎传》:“是时,江淮不通,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

〔3〕 李鑫:《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

〔4〕 林浩、林士民:《宁波出土白瓷的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5〕 藤本胜次译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95、96页,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华书局,1983年。

〔6〕 周世荣:《试探长沙窑销售和兴衰的主要原因》,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7〕 如唐咸通三年(862年)陈元通夫人汪氏墓出土邢窑白瓷唇口玉璧足碗。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福建卷》,50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厦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唐陈元通夫妇墓》,33页,图六七,文物出版社,2016年。

港口停靠过程中通过小额贸易中转流入停靠港^{〔1〕}。但总体来看,除数量众多的作为贸易中转和商船停靠的港口外,可以真正确定作为白瓷终极消费市场的地点很少。

东南亚地区,林士民曾对越窑瓷器的外销情况进行考察,认为在九至十世纪除了菲律宾的蒲端和爪哇岛中部的一些不在远洋贸易航线上的地点,该地区几乎所有出土越窑瓷器的地点均为商船过境的中转港^{〔2〕}。输入东南亚地区的白瓷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不过,蒲端出现中国瓷器的时间基本都在北宋以后^{〔3〕}。而爪哇岛上一部分位于中部内陆地区的遗址所发现的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瓷器,则表明这些地区是消费地而并非中转地,其中就包括在九世纪非常兴盛的普兰巴南神庙,该神庙遗址曾发现有晚唐时期的巩义窑白瓷。

位于爪哇岛中部的室利佛逝之巨港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中转中心,同时是联结中国南海及东南亚和印度洋两个贸易圈的交汇点^{〔4〕}。巨港发现有唐五代白瓷,但由于考古发掘信息较少,无法确知这一盛极一时的中转港口的白瓷消费情况。沉船出水陶瓷产品所反映的可能并非这些产品的生产规模和输出规模,而更直接地反映了启运港口的仓储能力和吞吐量。前述黑石号沉船,有学者认为船载大部分货物是从扬州装船起航,停靠广州,长沙窑等碗类装入广东产青瓷罐再启航前往波斯湾地区的尸拉夫^{〔5〕},或者是停靠广州后前往室利佛逝^{〔6〕}。这一装载方法不符合装载大量货物的船体的运输方式^{〔7〕}。秦大树的观点更为合理,即黑石号是从当时东南亚的贸易中转中心室利佛逝之巨港起航前往波斯湾地区的途中沉没,这些产品是从中国的扬州、广州等港口运往巨港中转,再一次性装载运往波斯湾地区^{〔8〕}。启航于巨港前往波斯湾的黑石号沉船和同样沉没于爪哇海域的晚至十世纪后半的井里汶(Cirebon)沉船^{〔9〕}、

-
- 〔1〕 Pradines, Stéphane, Review of “Mantai, City by the Sea”, *Journal of Islamic Archaeology* 2016, 3(1):145—149.
- 〔2〕 林士民:《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圈之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2:中国与东南亚》,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林士民:《试论越窑青瓷的外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5: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
- 〔3〕 Ronquillo, Wilfredo P. and Rita C. Tan, Yue, Yue-Type Ware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Butuan, Philippines, in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 D. 800—1400*, ed. Chuimei H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251—264.
- 〔4〕 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试论早期阶段海上贸易的模式——9—10世纪的文献记载及沉船资料》,《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 〔5〕 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年。
- 〔6〕 Guy, John, Rare and Strange Good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Ninth-century Asia, in *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ed. Regina Krahl, J. Guy, J. K. Wilson, et al.,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10, 19—27.
- 〔7〕 李旻:《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 〔8〕 秦大树:《试论早期阶段海上贸易的模式——9—10世纪的文献记载及沉船资料》,《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徐莘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9〕 Liebner, Horst Hubertus, *The Siren of Cirebon: A 10th-Century Trading Vessel Lost in the Java Sea*, Ph. D.,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2014, 113—116.

印坦(Intan)沉船^[1]，皆出水了数量众多的包括中国陶瓷在内的来自各地的货物，反映了室利佛逝在整个贸易体系中对于沟通东、西方的贸易交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室利佛逝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整个爪哇东部地区沿海港口和岛屿的交换关系，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有积极影响，并促成该区域在十一世纪以后参与到更为繁荣的海上贸易中来^[2]。

瑞苏查特(Amara Srisuchat)在观察泰国九至十世纪出土中国陶瓷器时，也注意到所有中国陶瓷器基本都发现于港口城市，位于中南半岛的泰国在此时只是作为中国瓷器的一个中转地^[3]。除了上述林门波和郭各考两个较为典型的马来半岛遗址，泰国其他遗址少有这一时期中国瓷器发现^[4]。马来半岛东、西两侧的林门波和郭各考遗址出土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和伊斯兰商品可能意味着在跨越马六甲海峡时存在海路之外陆上中转的情况。两个港口遗址出土遗物具有高度相似性，同时，考古调查表明这一区域除这两处遗址之外基本没有再发现汇集中国陶瓷、西亚陶器、玻璃器等遗物的遗址，发掘者据此推断两处遗址之间存在陆路运输。位于西侧的郭各考遗址出土的西亚玻璃器和陶器相对较多，而林门波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数量较多^[5]。这一发现似可证明两个港口间存在陆路交通：马来半岛西部，来自西亚中东等地的商船在郭各考遗址停靠，货物筛选后陆路运往林门波，再向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运输；马来半岛东部，来自中国的商船在林门波遗址停靠，瓷器经过拣选后，经陆路运往郭各考，再装船启运至印度洋沿岸地区，最后到达波斯湾等地。

南亚地区，整个印度东海岸这一时期仅在紧邻斯里兰卡曼泰遗址的贝里耶伯蒂纳姆遗址发现一片疑似九至十世纪的白瓷玉璧足碗残片^[6]，其他中国陶瓷器时代均晚到十三世纪以后。斯里兰卡曼泰遗址、印度西南部、波斯口岸苏哈尔遗址等地唐五代白瓷的发现，都是跨印度洋贸易链条上遗留的线索和痕迹，直指最终的目的地，当时波斯湾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

[1] Flecker, Michael,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Archaeopress, 2002; 杜希德、思鉴：《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Hall, Kenneth R., *Indonesia's Evol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Ninth to Early Eleventh Centuries: Evidence from Contemporary Shipwrecks and Epigraphy*, *Indonesia* 2010, 90:15-45.

[3] Srisuchat, Amara, *Discovering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Green Glazed Wares and Reconsidering Their Socio-Economic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ommunities in Thailand*, in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 D. 800-1400*, ed. Chuimei H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213-218.

[4] Ho, Chuimei,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Zhejiang Green Wa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o Kho Khao and Laem Pho-Payang, Southern Thailand*, in *New Light on Chinese Yue and Longquan Wares: Archaeological Ceramics Found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sia, A. D. 800-1400*, ed. Chuimei H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187-212.

[5] Bronson, Bennet, and Chuimei Ho, *A Silk Road in Southern Thailand*, *The Bulletin of 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Oct. 1991:1, 18; 何翠媚、班臣：《泰国发现的9世纪中国北方白瓷》，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6] Karashima, Noboru, Kanazawa Yoh, and Nobuo Yamamoto, *Surveys in Tamil Nadu: Periyapattinam/Nagapattinam/Devipattinam/Kayal/Kulasekarapattinam/Madurai Government Museum*, in *In Search of Chinese Ceramic-sherds in South India and Sri Lanka*, ed. Karashima Noboru, Taisho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27.

尸拉夫港。陶瓷产品再经这些港口中转流入都城等较大消费市场,如斯里兰卡曼泰港口繁荣时期的都城阿努拉德普勒发现的少量包括白瓷在内的中国陶瓷,即表明远距离贸易中间环节的小规模贸易的存在。陈万里^[1]、冯先铭^[2] 还曾提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七至十一世纪商业中心城市布拉米纳巴在 1020 年大地震以前的遗物中发现包括唐代越窑青瓷、“邢窑系”白瓷以及北宋青瓷在内的中国瓷器。这一远离海岸的内陆遗址发现白瓷,或可理解为经沿海港口输入内陆的消费品,也有经由该繁荣商业城市再向内陆中转的可能。

斯坦因(Aurel Stein)对尸拉夫进行考古调查,未发现伊斯兰以前(pre-Muhammandan)的文化遗存,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尸拉夫是适宜发展成海上贸易中心的证据^[3]。根据对植被、土壤等的研究,可知尸拉夫的农业和灌溉相对优于其邻近地区,但其产出却远不足以维持城市的运转,有许多粮食是通过陆路从伊朗高原进口的^[4]。尸拉夫的兴起与印度洋贸易的繁荣密切相关。十世纪波斯地理学家伊什塔克尔(Al Estakhri)对尸拉夫有详尽记载,在其记述中提到,尸拉夫当时的城市规模和重要性已经可以和舍拉子相比,但这里并不是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建造豪华房子所需的木材来自东非桑吉岛,城市所需的灌溉、饮用水,日常食用的水果也都是从较远的地方专门运来的,但这里却可以见到从全国以及包括印度在内的海外进口的各种奇货,城市里也有自己的纺织手工业,且有着非常发达的珍珠贸易;稍晚的另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哈卡勒(Muḥammad Abū'l-Qāsim Ibn Ḥawqal)进一步指出,尸拉夫的居民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商业和贸易上^[5]。货物到达尸拉夫后,从这里出口至东非和红海地区,重新装小船前往巴士拉、巴格达以及在九世纪时的新都萨马拉,或者经内陆运往法拉什班德、舍拉子和伊朗高原的其他城市。同时,尸拉夫的商人利用远洋贸易获取的利润去换取当地较为缺少的食物甚至饮用水,来维持一个城市的运转^[6]。从尸拉夫和东非地区的考古发掘来看,许多廉价、庞大的资源,例如木材,都是从东非运往波斯湾^[7]。尸拉夫作为直接与东南亚、南亚进行贸易的港口城市,发现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陶瓷器。九至十世纪,许多销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陶瓷器是从尸拉夫输入的。苏莱曼(Sulaiman)记载当时大量从伊拉克出发前往印度和中国的

[1] 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 9 期。

[2] 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 年第 6 期。

[3] Stein, Aurel.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s in North-Western India and South-Eastern Ira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7, 212.

[4]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iráf; Sixth Interim Report, *Iran* 1974, 12:1-30.

[5] Wilson, Arnold, *The Persian Gulf: An Historical Sketch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outledge, 2011, 94.

[6] Whitehouse, David, Siraf: A Medieval Port on the Persian Gulf, *World Archaeology* 1970, 2(2):141-158.

[7] Chittick, Neville, *Manda: Excavations at An Island Port on the Kenya Coast*,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1984, 19; Whitehouse, David, Excavations at Siráf: Second Interim Report, *Iran* 1969, 7:39-62.